

七 河 史

〔俄〕巴透尔德 著

V.敏诺尔斯基英译

赵 俪 生 中译



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蒙古语教研室

一九七八年九月 兰州

七河史

133

俄 V.V. 巴图尔德 著

V. 敏希尔斯基 英译

赵 丽 生 中译

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
蒙古语教研室

一九七八 九

巴托尔德（即：瓦西利·符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研究伊朗史、外高加索各国史、阿拉伯各国史、突厥诸族史、蒙古史、伊斯兰教学——在中亚史方面成就最大”。

巴托尔德在世时 1892 — 1930 年间，曾出版过学术著作四百多种，其中不少已被译成各国文字，在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

苏修伊·彼德鲁舍夫斯基在其《巴托尔德传》一文中，对巴托尔德有如下评价：“对自己的国家和苏联科学贡献了如此丰富的著作遗产的优秀人物和卓越学者。”

为了提供中俄关系史，以及民族史研究的有关资料，我们国内印刷了他的《七河史》。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这份资料的中译文是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德生同志译出并慨然提供给我们的。对廖德生同志关心、支持我们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诚挚精神，我室谨表深厚谢意。

同时对热情协助了我们工作的甘肃师大关宜权先生以及我院承印单位的有关同志，我们也一并致以谢意。

此系国内参考，特妥善保存并勿转载。

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蒙古语教研室

一九七八·九

目次

作者介绍：

(英译者 V. 敏斯尔斯基 给《中亚史研究四种》所写的引言)；

七种史：

(一)	<u>马孙简史</u>	44
(二)	<u>突厥简史</u>	47
(三)	<u>葛逻禄简史</u>	22
(四)	<u>喀喇汗朝简史</u>	29
(五)	<u>喀喇契丹 (西辽) 简史</u>	37
(六)	<u>三汗文合汗国简史</u>	49
(七)	<u>帖木儿汗国 (莫卧儿斯坦) 简史</u>	81
(八)	<u>准噶尔简史</u>	106

巴透尔德（1869—1930），是穆斯林东方学的伟大史学穴，也是一位著名人士。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伦敦《太晤士报》的讣告中称他为“土耳其斯坦学的吉本*”。这句称号，重点指出了巴透尔德对于从里海到蒙古和中国之间广大地区的研究工作的重要牲；并且，即使在那一地区之外，甚至相距甚远的地方，有很多伊斯兰历史学的分枝上已，也都打下了他的劳迹的印痕。他写过一本《伊朗的历史地理》，一本《西欧和俄国对东方史的研究》，一本对伊斯兰国穴两大支柱的研究《哈利发和苏丹》，还有另外几种有关伊斯兰和伊斯兰文明的书，这还不包括在有关伊斯兰文明、历史和地理、传记以及书译这样一些主题下的许许多多篇重要论文，其中的一部分确确实实是智慧和学识的珍宝。巴透尔德的著作目录包括四百个以上的选题，并且我们可以满怀自信地说，在后人继续研究的光亮照状下，他的这些著作几乎没有哪一种已经失去了它的应用价值和兴趣。

巴透尔德1869年生于圣彼得堡，出身于德国血统的一个富裕穴庭。他的教名是维廉，但是很也就甘心承认了一副俄罗斯化的本名和父名：“瓦西利·涅拉几米罗维契”。俄语成了巴透尔德的母语，并且他亲自承认某次向外国听众之读他自己用德语写作的论文的时候，还须请一些朋友帮助矫正。他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并

* 吉本是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

且从1896年起就在这同一座大学里教课。1912年他当选为俄国科学院士，他担任这一职位直到1930年8月19日的逝世。他与大学和科学院的紧密联系还反映在婚姻关系上，他的妻子是当时著名波斯学者V. A. 茹阔夫斯基（1858 — 1918）的妹妹，而茹氏的另一个妹妹则嫁给了N. Y. 马尔教授。

巴透尔德是一位有着苏格拉底式的严峻外貌的人，学生们对他的嘲讽怕得要命，但是一离开讲台，他也会把深情厚谊给与别人，并且经常带头对真才实学和事业上的进表心表示鼓励，只有当人们把一些浅薄之见冒充什么绝对真理的时候，巴透尔德从不要胁，而宁愿冷酷无情地将这样一些庸浅之作撕得粉碎。他在自己身边散佈了一团带崇敬的警惕；每一位东方学者在动手要写一篇论文的时候，都不免想道：“巴透尔德会有什么看法？”当代有一作穴，一度慌手慌脚地要泡制一卫伟大德国学者玛卡尔特（J. Marguart, 1864 — 1930）的传记，而玛氏的许多观点又是巴透尔德长期坚持分歧的。最初读到这卫传记的目录刊登出来，巴透尔德立即由于其中的一小撮疏忽和讹误就大发脾气，竟在一封大加指斥的读者来信中忘记了签署他自己的姓名。这是一场实有忍义的教训，而当前我在写作有关巴透尔德的目录的时候，虽述玛卡尔特的门徒们和传记作者们都寄来了贺词，但我仍要反复加工，杜绝一切可能的漏失。

跟着岁月的增进，巴透尔德的脾气由于年龄和经验而温驯了。

“也许你是对的，但对于我来说，事情的相反往往比我所期望的表现得强烈的多。而这就使我在承认别人功劳的时候显得软弱。……当我写评论我老师V. I. 隈割洛夫斯基的文章的时候，我主观上本想尽可能说好话的，但在别人理解起来，却成了一场放肆的和过度的辱骂。这件事一想起来就使我忏悔。”（1929年7月2日通信）。

在许多肢体方面的衰疾之外，一九九二年当他去七河省进行第一次考查旅行的时候，就摔断了腿。他返回塔什干进行治疗。但是转年的春天，他又毫不迟疑地去完成了他的旅途。他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慕，能够压服任何其他考虑。有一天，他对他年轻的外甥马尔说，“咱们到美国观光去吧”，于是他们就坐轮船到了纽约。巴透尔德曾经在欧洲的许多图书馆里长时间地工作过，在伊斯坦布尔和开罗也是一样，每次都谨慎地考订着他的研究和发现中的成果。几乎每一年，他都要到土耳其斯坦去做一次“朝圣”，在那里，他熟悉每一位学者，每一份私人收藏的文物，甚至每一本罕见的书。巴透尔德的一椿值得人们记忆的事迹，是在俄国的和穆斯林的学者们、官员们、教师们、医生们和工程师们之间，引发一种对地区历史和古物的兴趣。他成为他的考古队的组织核心。他跟大灾祸做通讯联络，在地方报纸上即刻写文章，对现场人员可能发生兴趣的特殊问题都进行调查研究。他给《七河史》所写的前言，是他所悬目标与具体实践的最好见证。

巴透尔德是三种穆斯林语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的学者，并且使用这三种语文出版过著作；但是他最主要的特徵是，他并不是作为一个东方语言学家走进了历史学，而是一个配备了东方语文能力的历史学者。在他的论文中，特别是在他一生的晚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总的历史文献方面是多么地娴熟，他在探讨诸如移民、封建主义、沙利曼大帝和哈利发的通讯诸问题时，他是何等地在行。对于巴透尔德来说，没有所谓“第二手”的资料；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他是从原始资料中生长起来的，每年都要把资料从头重新汇编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用中世纪土耳其文编写的喀什噶利氏的字典刚刚在土耳其发现后不久，当时俄国正在革命，但巴透尔德通过艰深的阿拉伯语，通读了这十分庞大的著作，并且从中取得了史料。他对于所有新出现的资料来源，对于每一次新的地理探险，每一次新的考古发现，都是如此办理。东方学的资料也许有一天会竭尽。巴透尔德的目光却始终注视在经济因素的影响上，法令上，贸易的通运上，艺术上，以及一切值得重视的其他因素上。在这方面最光辉的例子，就是通过他的史学专著《蒙古佔领时期的土耳其斯坦》而推动了“十五个专题”的科研任务出来。

一九二八年，他的这一“划时代”著作在H. A. R. 吉卜教授和罗斯爵士（此人早年曾在聖彼得堡听过巴氏的讲课）二人大力主办下译成英文，并在纪念吉卜氏的丛书中出版。印度的沙伊德。

苏赫拉瓦博士也把他的一下有关伊斯兰文明的小书翻译出来，在加尔各答出版（一九三四）。他的其他著作也都译成了法文、德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关于他的著作，已经出现过三份目录两份德文的和一份俄文的，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战的前夕，德国学者们还积极着手来翻译并吸取巴氏著作中的精华连零散的篇章也不放过。

巴透尔德一生坚持自己在学术问题上的独立见解。在革命前夕，他的一些关于俄国东方学研究脚步有些放慢的发言，曾引起过骚动。而当他发觉在他亲自创办的刊物《伊斯兰世界》上由于某些偶然因素略微降低了水平时，他就退出了该刊的编委会。大革命以后，他的一些有关封建主义的见解曾在《新东方》（Новый Восток）上引起过尖锐的争论，但最终也把他无可如何。即使在情况十分暧昧并且混乱的关头，巴透尔德依然保持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高瞻远瞩的态度，这在他的著作《密尔·阿里·锡尔》的绪论部分中可以反映出来。

巴透尔德的权威屹立不衰。在大革命以后，在土耳其斯坦一度出现过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人们激动地支持一种叫做“我们有决”的瓦则，事事如此甚至字母也要改创。即便在那些岁月里，土库曼和吉尔吉斯的官方，依然约请巴透而德替他们撰写他们社会的历史。在土耳其马斯太发·凯末尔新政府的邀请下，他曾到伊斯坦布尔做过一系列的土耳其史学术讲演，后来在土耳其印成了书。

作为他忠诚伴侣和助手的妻子的去世，对巴透尔德说来是沉重

的打击，特别在当时，他的教课和写作的任务正在增重。“我的日常工作是永无休歇的；刚送完了葬，我就得工作起来”（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通讯）。在另一通信中，他说“在我的一生中，还不曾有过像现今这样的压力”。大革命之后，写于公元982年的波斯地志《胡达·阿尔·阿兰》这份举世没有第二份的写本就要离开俄国的大地了，但是当代的作者们依然成功地从巴黎把它进行复制带回彼得堡来。巴透尔德王生最后的一下巨着，就是将这一摹本付印，并对死穆斯林地志作者撰述了著名的《引言》。这篇引言是用于学者从终身苦干中艰难地搜集并积累起来的事实的全而掌握而写成的；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活着看到此书的印本。

在献给巴透尔德的唁词中，伯希和的一篇特别值得重视。这位地名的当代法国东方学者（死于1945年10月26日）写道：

"tant par l'étendue des connaissances que par la pénétration et la netteté de l'esprit critique, l'oeuvre de Barthold est d'une solidité et d'une variété exceptionnelles. Ce grand savant laisse vide une place que nul n'est préparé à occuper comme lui. Et il vaut peut-être de rappeler que, par la loyauté, le désintéressement et le courage, l'homme fut chez lui à la hauteur

du savant”。①“无论从知识的广度或者深度，或者从他进行批判时的精确度，巴透尔德的著作都表现出一种坚实和出奇的多样性。这一伟大学者空出了一个位置，使人无法填补。一想到他的诚挚、无私和勇气，人们就感到在他身上，集注了一切学者的崇高”。

在巴透尔德的遗著中，我们特别选这四篇专著来译成英文，目的是为了说明在土耳其斯坦历史和七河地区历史中的一个总历程。必须提醒一句的是，目前这本书的编辑，并非按照原作者写作年代的前后，而是按照该四种专著内容的纪年次序。除此之外，由于在这四种专著各自写作的年代间有着相当段落的隔离，所以每一种专著按照它自己与其他三篇稍有不同顺序，在对待同一件事的时候，不免有所重复。在对这些论文进行改编的时候，经过考虑，要消除这些重复是不合适的，因为那样将会伤害每种著作中所特有的逻辑。还有，读者在熟悉了巴透尔德的“压缩风格”所具有的特色之后，一定会有兴趣去细读注释，而这些注释又不是在其他三种中都具备着的。

现在，假如我们对四种专著再分别地予以介绍，那么，情况就会了然了。

（一）．《土耳其斯坦简史》。这是巴透尔德在1920—1921年新创办的土耳其斯坦大学所作讲记的一份节要，1922年在塔什干出版。因此，它的特色是注脚很少，并且较之其他

三种，文字更加通俗。这篇著作，跟巴氏的名著《蒙古佔领时期的土耳其斯坦》（1900年版）表现为迥乎不同的风格。採用一种非常小巧精悍的形式，这本《简史》的内容却是包含了很长的历史段落，从无可回忆的年代到俄罗斯人对它的征服，并且，考虑到这篇东西的包罗万象的特点，它对于《四种》来说，倒是一篇有用的导言。为了将其中一些会引起普遍兴趣的论点标识出来，我在本文附录中将由巴氏所提出的所谓“十五项选題”排列出来，恐来不是无用的。在这十五项要点中，巴透尔德将他自己的主要结论总括在一起，这样，拿来译成英文，不仅对本书读者会有帮助，即使对于1928年《土耳其斯坦》英译本的读者也会有所裨益。

（二）. 《七河史》。1893年出版于凡尔尼（今名阿尔马-阿达），这是在巴透尔德决定终生献身于土耳其斯坦史的研究之前七年写出的。这一最早作品，写出至今，已历半个世纪，但即便在今天看来，它将亘于正土耳其斯坦与西伯利亚之间的这片领土上的为世人罕知的若干史事予以梳理的这一点上，依然是举世无双的。Semirech'ye（谢米列契）这个俄文字眼，即土耳其语 *giti-su*（吉蒂·苏），亦即“七河”的意思，它所指的这片草原，横亘于伊塞克和巴尔喀什这两大湖泊之间，再加上以西的一些陆地。过去的七河地区，在今日之苏联已经划分成为卡查赫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了。在巴透尔德的大著《土耳其斯坦》一书中，他曾经多次提到《七河史》，可是即便在俄国内，这本书也一直是

弄不到手的，直到最近才在当代探险家与地方文物收集家伯尔斯坦（A. N. Bernstam）博士的督导下，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费里芝市出版（1943年）。在转译许多中国名目的过程中，我深得已故的剑桥大学哈龙（G. Haloun）教授的帮助。

（三）《兀鲁伯》。写于1915年，出版于1918年。这是巴透尔德对史迹进行辛勤调查的良好样板。这本专著，沿着前边两本著作所遵循的总体规划继续前进，并且对《土耳其斯坦》一书所遗留下来的蒙古占领时期的线头，予以重新拾起。从《兀鲁伯》这本专著所依据的老老实实的资料来源上，以及它在当代所进行的调查工作的确凿性上，对于处在中亚中若干繁乱——混乱中的帖木儿帝国（公元1400——1450）这段不长的历史，投给了一线的光明。

（四），《密尔·阿里·锡尔》，这是《四论》中著作年代最晚的一种。它出版于1928年，编在苏联科学院为纪念中亚细亚最晚出现的帖木儿王朝中最著名的这一政治家和著作家诞生500周年纪念而印行的丛书之中。假如说，《兀鲁伯》的故事，是以撒马儿罕为中心的话，那么《密尔·阿里·锡尔》的故事是以今阿富汗西北边境上的哈烈（Herat）（即赫拉特）为中心的。这本同样详尽的专著，标志出了帖木儿后期王朝（1450——1500）的另一世界。

巴透尔德的行文往往艰深费读，翻译起来也并不比较容易。作

者在写作时很少考虑如何帮助读者来消化这份精神食粮，无论是一遍遍重读也好，或者把一些具体节目漏掉不读也好，作为科技书，大学生们更须加倍集中精力。翻译者们曾经做了种种努力，试图将原文沉重的结构予以缩补或者简化，但是他们又担心即便写出更流畅的英语的借口下，他们有没有权力“改写”原著；这样，会造成改变作者原有目的的后果。

四种著作中充满了艰深的东方名词和字眼，土耳其的，蒙古的，中国的，阿拉伯的，以及波斯时。前两项语文在对音系统上说是拼音的，而在后三种的情况下，作者必须或多或少顺应原始的字体，以致迫使这一行道的学者不得不先按原体照描，然后再进行转译。在目前的这本书里，我们尽量当心不使由于音符太多而使内容更加复杂化了。著名的人名和地名，都按照通常的形式写出。对于“华扎”这个称号，我们按中亚式的发音，拼为“霍扎”（即“火者”）。在更艰深的情况下，当一个词儿第一遍出现时，我们将准确对音予以注明；等以后再现时，则仅仅予以提示就是了。不顾会被人谴责为轻率的罪名，翻译者们尽量使读者不感觉到阅读的困难。对原著中巴氏本人对东方语言所做的注脚，我们也都用英文一一予以译释。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五日，于剑桥。

七 河 史 本 文

我们带着高度的喜悦心情，接受了七河省要我为1898年该省的《年鉴》写一篇七河地区的简史和大致编年纪要的邀请。使一个中亚史学的工作者深感慰藉的事实，这也就是七河地区史之所以引发兴趣的根由，就是没有当地人民的积极合作，任何这方面的研究题目都不可能获致到完全的和透彻的成果。我们的史料根据经常是片断的、不完全的，随时需要考古资料来予以补充。人们假如到这一地区来仅作短时间的访问，而未曾与当地居民保持亲密的接触，那么这样的人所搜集到的史料，往往会遭遇不可克服的种种困难。只有长期的当地居民才能够在一个充分巨大的规模上进行地区性的研究，并且能够拿真正有价值的发现来丰富我们的知识。譬如在皮什伯克和托克玛克附近发现的七河地区景教（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墓葬就是一例，但这种探索似乎一直在一种偶然和随意的情况下进行。相当大量的考古材料在未经研究之前，就已经不见了。托克玛克的居民过去经常在伯朗那附近古代河渠的底床中发现大量的钱币，但等我去时却一个也找不出来。像其他的任务一样，任何地区的古迹研究也非通过一定的组织群众不可。因此，让我在这里表达我

种考证，主要基于二者声音的极其相似。月氏后来在中国遣使通西域的同时，又被乌孙赶走了，虽然塞种和月氏种的卫分遗民，依然留居下来。〈原注〉在七河地区，乌孙国王猎骄靡，拥有“昆莫”王号，逐渐强盛，不再臣服于匈奴。乌孙东界当与匈奴接壤，但中国史书对此并无详细记载；乌孙之南，是今新疆境内的一些长期“居国”，其东南是大宛，其西是“行国”康居。由于乌孙国居在大宛的东北，康居居在大宛的西北，那么它们两国的疆界，大体上可与今日七河省与锡尔河省的疆界密合。至于提到乌孙的族源，仅仅他们语言中的一些人名、称号从中国记载中流传下来。语言学欠一直对它们尚未予以研究，而我们仅能指出其人名经常以“靡”音结尾。有关它们的外貌，我们只能根据一位更晚的（公元后七世纪）中国作者颜师古所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专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判断究竟乌孙是如很早的东方学欠们阿拜尔·莱缪萨以及克拉普劳蒂所设想的亚利安人呢，抑或如晚近的突厥史欠拉德洛夫以及阿利斯托夫的意見是突厥人呢，其根据都是不充分的。

乌孙的牧地主要当位于七河地区，因为中国史料说它“地莽平”。又提到“多雨，寒”。又说“山多松栢”。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它的都城，或者勿宁说它的主帐所在地，赤谷城，应在今伊色克湖的东南岸一带，因为中国人描述它的方位在阿克苏西北610里，大宛东北2000里，即离中国边境50

〇〇里。在七世纪一些中国人的行记中，说它在距柏达关隘50里的方位上，但这份行记几乎是完全不可信的，需要汉学家重新予以审订。我们不知道阿利斯托夫根据什么说赤谷在七济河的岸上，但我们同意他这样的说法，即像乌孙这样的“行国”，要寻其房屋遗址，那是没有意义的。即便利用伊色克湖岸边与湖底发掘出来的碑记去考证它。（到现在还有人这么干），也是没有意思的。我们一定会弄清楚，伊色克湖边的城寨遗址，是在乌孙这个名词早已被人遗忘了的年代中建立起来的。

到公元前105年，中国使臣张骞到达乌孙，劝其东居故地，与中国结为昆弟，以制匈奴。使节在昆莫廷中遭到冷遇，他的计划未能得到反响。只有当乌孙使节伴随张骞返国，见汉“人众实厚”，归国报告后，汉之威仪始得显张。然此时继张骞之后汉使相属不绝，多迎西大宛，乌孙所得赐少。于是昆莫遣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许以马千匹为聘。汉许聘，乌孙以汉公主为右夫人，而匈奴单于之女为左夫人。公主悉到风俗迥异、语言不通，因悲愁作歌，言其远托异国，嫁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公元前102年，汉伐大宛。汉人邀援兵，乌孙遣两千人助，待机而动，并未参与实际战斗。

昆莫老将死，愿使其孙军须靡尚公主。公主不听，汉天子劝其从乌孙国俗。军须靡官号曰“岑陬”，其匈奴妇所产子曰泥靡。“岑陬”将死，泥靡尚幼，国无权柄，暂与“岑陬”季父子翁归